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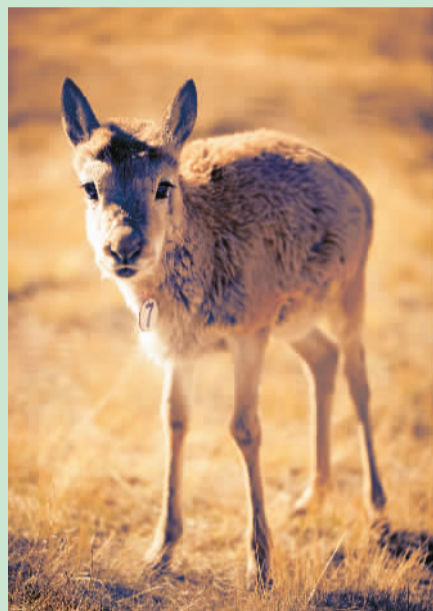
可可西里无枪声

本报记者 杨俊峰



图为可可西里附近的高原雪山。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图为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里的藏羚羊宝宝。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是世界第三极上的旷野，这里的含氧量不足内地的一半，这里被称为生命的禁区。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青色的山梁”。在这片高峻、寒冷的土地上，藏羚羊是跃动在大地上的精灵。然而，在盗猎者、淘金者的贪婪捕杀和盗采之下，可爱的藏羚羊曾经面临种群灭亡的危机，这片土地一度满目疮痍，生态受到极大的破坏。

20多年前，一群普通的年轻人，走进了空旷的可可西里。从杰桑·索南达杰到嘎玛才旦，这些年轻人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可可西里。这些可可西里守护者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捍卫着可可西里的安宁，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和灵魂，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图为巡山队员洛松巴德在救助藏羚羊宝宝。 (资料图片)

荒原上的“冰雕”

沿着青藏公路开车可知天地之大。

9月28日，我们启程前往三江源国家公园之行的最后一站——可可西里。翻越遮天蔽日的昆仑山，越野车在山的阴影里蜿蜒攀升。直到某一刻，山脉停步在地平线上，天地顿时开阔：金黄的草原绵延万里，万千湖泊点缀其间，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在湖边驻足饮水。

这就是著名的可可西里。

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人口，矗立着一尊铜像，边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经幡和哈达。路过的藏族同胞纷纷停车致敬。

我问司机：“这是谁？”

司机回答：“英雄。”

英雄名为杰桑·索南达杰，1994年1月，牺牲于可可西里的隆冬。

1992年7月，时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组织了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治多县西部工委，别称野牦牛队，并兼任西部工委书记，在任内，索南达杰曾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亲自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成功抓获8伙非法持枪盗猎集团。

1994年元月，索南达杰率领4名工作人员在可可西里太阳湖附近抓获了20个偷猎者。因为偷猎者中有两个伤病员，索南达杰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派2个工作人员押送他们连夜赶往几百公里外的格尔木治疗，自己和另一个工作人员则押送剩下的偷猎者和缴获的车队，索南达杰自己留在最后一辆车上压阵。

偷猎团伙看到执法人员少就乘机反扑，将第一辆上带路的工作人员击昏并抢走了武器，然后把中间的车排成弧形，用猎杀藏羚羊的方法杀害了索南达杰。

索南达杰的牺牲是这样悲壮——这是一场他孤身一人面对11个盗猎者的战役。一名盗猎者打开吉普车的车灯，负责定位索南达杰。车灯打开的刹那，索南达杰向吉普车开了一枪。随后车灯熄灭，11支枪对着索南达杰的方向

开火。

枪声停歇后，盗猎者不知索南达杰的死活，不敢走近查看，各自逃命。

一颗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他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在他身边，是截获的两卡车2000余张藏羚羊皮。

两天后，当他的助手、双手冻僵的勒茨祖循着记忆中的路线回来找他时，索南达杰已经在滴水成冰的高原上被冻成了冰雕。

在寺庙里，索南达杰的遗体覆盖着党旗，武警战士为他守灵。他走后，遗体被政府恭送至寺院，以酥油火葬，这是只有高僧大德才能享有的仪式。

杰桑·索南达杰成为可可西里一座无可替代的丰碑。英雄已逝，而这片苍茫大地上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卡了壳的冷枪

十年前，可可西里一度曾是不为人知的“战场”。

在与危险和死亡擦肩的无人区，在一次次与生存极限的挑战中，在一次次与盗猎者的斗争中，巡山队员们一起爬冰卧雪，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历练。

经历了藏羚羊盗猎高峰期的可可西里第一代保卫者，都有说不完的反盗猎经历，让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站长嘎玛才旦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6天6夜的追捕。“当时是6月份，到了藏羚羊去卓乃湖的产羔期，我们接到线索说一群盗猎者要从花土沟绕道进入可可西里，有枪有刀有黑社会背景。”接到线索后，嘎玛才旦带领驾驶3辆车，往卓乃湖方向进发。“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走哪条线路都不清楚，只能边走边找。”在无人区兜兜转转了6天6夜，没找到一丝踪迹，终于在第六天晚上狭路相逢。

“我清楚地记得，远远看见3盏车灯，宛如大漠深处的‘幽灵’一般。”嘎玛才旦说，队友们立刻端枪上膛，只等会车时，一对一地去堵住对方的车。

想起制服他们的过程，嘎玛才旦至今仍觉后怕。“对方可能以为我们是‘同行’，快会车时也没有提防。直到逼到

对方停车，才出现战斗。”鸣枪警示后，队员们打瘪了对方的车胎和后视窗，然后冲上去。一片黑暗中，大家只能借着车灯行动，一阵枪声、嘶吼声过后，8名盗猎者中的6人被拿下，另外2人趁乱逃走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回去清理现场，发现路边地上扔着一把上了膛卡了壳的半自动步枪，才知道，头晚溜走的2人，趁着夜黑朝我们放冷枪，结果枪卡了壳，他们才跑了。我们真是运气好。”每每想起这次历险，嘎玛才旦总会习惯性地搓搓手掌，感叹是可可西里的生灵护佑着巡山队员们。

“保护区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武器装备十分有限。但是，每次出发的时候，每个队员腰间的枪套都是鼓鼓的。其实那就是塞满了石头的空枪套。每次遇到盗猎分子的时候，我们的队员就靠拍这个枪套来镇住对方。”巡山队员赵新录说。

当然，有时候这一招也不灵。有一次，赵新录和队友们发现了一个9人的盗猎团伙，他们每人都有一把小口径步枪，但巡山队员们5个人只有一把枪。面对这样的情况，空枪套不起作用了。“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人因为缺氧反应速度会变慢，所以我们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先将团伙头目控制住，然后喝令其余的人缴械投降。等把枪缴过来一看，我们才感到后怕，他们的枪子弹都上了膛，如果我们稍有疏忽，后果就不堪设想。”

挖旱獭的笨熊

才仁桑周今年43岁了，作为一名在可可西里沱沱河工作站守护了12年的老森林公安巡山队员，去年他正式退休了。

2016年的一天，才仁桑周在保护站里忽然晕倒，在站里昏睡了20天，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已经没力气爬起来了。“说实话，还是愿意留在站上，毕竟12年，有感情了。”才仁桑周叹了口气，“但是身体确实不允许了。”20年过去了，可可西里高原大风依旧，然而景象已然不同。

从空中看去，伴随着青藏铁路驶过的列车的鸣笛声，成群结队的藏野驴在广袤的荒原上奔驰，“高原精灵”藏羚

羊四处可见，胆大的甚至敢到青藏公路路边探险。高空中，红隼在自由地翱翔。远处，健硕的藏野牛在杀气腾腾地寻找下一个可以挑战的对手。

如今的可可西里，已不复当年荒原，四处可见生机。

关于救助藏羚羊，赵新录对一件往事记忆犹新：“我和队友去卓乃湖临时保护站值班。正是藏羚羊产羔的季节，我们俩先后救助了7只失去妈妈的小藏羚羊。它们没有奶吃，我们就把我们的干粮给它们吃，这样，我们的食物很快就不够了。那时候，我们每天也就吃点挂面、方便面、饼干。为了节省食物，我和妻子每天每人只吃两袋方便面。但是加上7只嗷嗷待哺的小羊，我们的食物最终还是吃完了。”

晚上，赵新录听见妻子做梦在骂自己，就推醒了她，问他是怎么回事，妻子揉着眼睛不好意思地说：“我梦见你一块饼干送给了别人，我正跟你吵架呢！”“我听完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这说明你还没饿死。”赵新录说。

“现在可可西里地区的藏羚羊种群就由20年前不足万只发展到6万多只，”才仁桑周自豪地说，“算上西藏和新疆那边的数目会更多。能看到可可西里在我们的呵护下慢慢变好，这辈子都值得了。”

在巡山过程中，才仁桑周经常会看到一些动物有意思的举动。“有次我看到一只棕熊像人一样蹲在那儿。他找到一个旱獭洞，在那儿挖旱獭吃。”才仁桑周说，那只熊爪子很大，三下五除二就挖出一只又肥又大的旱獭。挖出来之后，它也不吃，把那只旱獭往自己胳膊底下夹一夹，然后接着挖第二只。可笑的是，它挖出第二只以后，还往胳膊底下夹，结果这边还没夹上，那边胳膊一松，原来的那只就跑了。熊也不在意，就这样总共挖了8只，挖一只跑一只。最后那只最倒霉，因为它后面没有别的旱獭了，这个倒霉蛋就被笨熊夹在胳膊底下抓走了。“原来说狗熊掰棒子我还不信，现在看来老人们的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啊。”才仁桑周笑着说。

这就是现在的可可西里，宁静安详中带有一丝诙谐，这是属于人与天地的默契。这里已经10年无枪声了。

特朗普：“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或者更早，所以你们有5000年的历史。”

习近平：“有文字的（历史）是3000年。”

特朗普：“我想最古老的文化是埃及文化，有8000年历史。”

习近平：“对，埃及更古老一些。但是文化没有断过流的，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

特朗普：“所以这就是你们原来的文化？”

习近平：“对，我们这些人也是原来的人。黑头发、黄皮肤，传承下来，我们叫龙的传人。”

特朗普：“这太棒了！”

——摘自习近平主席夫妇同特朗普总统夫妇参观故宫时的对话（2017年11月8日，根据央视视频整理）

背景资料：

“龙的传人”是中国人的自称。龙的形成记录了古代民族发展的聚合过程，起着维系和向心的作用。龙文化已成为东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常引以为豪。

由于龙的这一特殊性，事实上它已经成了我们的文化图腾。在一篇传播很广的小学课文中，非常生动地解释了我们为何被称作“龙的传人”——

“我们都知道，龙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动物。它只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和传说中，是中华民族远古时期所崇拜的图腾。

龙之所以备受中国人崇敬，是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龙是出类拔萃、变幻万千、无所不能的。龙王高居天上，它能呼风唤雨，翻江倒海。天下旱涝，庄稼丰歉，人间祸福，全凭它的旨意。

龙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皇帝自认为是“真龙天子”。他的身体称为“龙体”，他穿的衣服是“龙袍”，他坐的椅子是“龙椅”……故宫里单是大和殿，便装饰有1.3万条龙。

但龙的形象并非帝王所专有，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龙又象征着自由欢腾和完美。所谓“金龙献瑞”“龙凤呈祥”“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说的就是这种祥和幸福、欢腾自由的景象。

西方也有龙的传说，但西方的龙不同于中国的龙，西方的龙往往集各种凶恶于一身，专干害人的事情。中国的龙则是集各种能力于一身，象征着中国人对自由完美的向往和追求，所以中国人常常自称为“龙的传人”。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我们叫龙的传人



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

邢三令：讴歌民族英雄 唱响“一带一路”

郭超凯



图为邢三令。

追求纯粹音乐，探寻世界音乐的道路，邢三令从未停止他的步伐。

1988年，邢三令14岁，第一次摸吉他，此前毫无专业音乐训练的他居然把弦给摸准了。

1992年，他离开家乡山西平遥，被北京武警文艺团体特招人入伍，期间，进修于

军艺，主修作曲。

1995年，邢三令退伍，一头扎进北京音乐创作的第一线。

多年的经验积累让他收获颇丰，音乐创作也渐入佳境。2017年10月，邢三令作曲的《支嘎阿鲁王》正式上线，这首取材自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的同名歌曲旋律动听，恢弘大气，生动地诠释了彝族英雄支嘎阿鲁王测天量地、移山填海的传奇故事。

生长于平遥，创作于北京，立志于做无边界世界音乐的邢三令，多年来常前往四川、贵州等彝族人民聚居的地区采风，从彝族音乐、文化中汲取营养。

“彝族人民大多能歌善舞、热情好客，我对彝族有着特殊的情感，也从彝族文化中找到了不少音乐创作的灵感。”谈及彝族，邢三令眉宇间多了几分精神。

为了创作好《支嘎阿鲁王》这首歌，

踏着北京深秋的落叶，穿过悠长的前厂胡同，精致的院落中传出悠扬的旋律“走，让我们一起走，共拥有共包容，为幸福爱地球……”这是“一带一路”主题歌曲《One Belt One Road》作曲人邢三令在弹唱自己的得意之作。

“我希望能做不分国界、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的世界音乐。”这位身穿黑色高领毛衣、举止儒雅的音乐人在采访中对着笔者说道。

2017年5月5日，由资深音乐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爱心大使邢三令和媒体人苏赢联袂打造的歌曲《One Belt One Road》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全球首发仪式。动听的歌声回响在“鸟巢”的上空，彼时站在发布会舞台上的邢三令眼神闪烁。

尽管从事音乐创作多年，但面对“一带一路”这一重大命题，邢三令丝毫不敢懈怠。为了谱好这首曲子，他走访了越南、印尼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入各国民间采风，寻找创作灵感。

“‘一带一路’是面向全世界的，所以应该用世界的情怀，用世界音乐人的态

度去做。唯有以大爱和家庭为主题的音乐才能最大程度地打动人。”邢三令说道。

为了能全身心地专注于作曲，他选择在深夜创作，往往一写就是一整夜。盛夏夜晚，酷热难耐，豆大的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裳。作曲的过程痛苦而煎熬，邢三令写了又改，改了又删，如此反复，地面上尽是被他撕掉的、不满意的作品。

长达一个月日以继夜的创作，多种不同风格的尝试，前后多达数十次的版本修改，直至最终的定稿已经几乎没有第一版的痕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邢三令的努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歌曲《One Belt One Road》一经发布便好评如潮、广为传唱。

献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位音乐人用朗朗上口、直达人内心深处音乐作品作出了表率。



本栏目主持人：严冰